

《刺秦考》：文本与观念的先锋性探索

汪光平

潘军的《刺秦考》作为其“春秋战国秦汉三部曲”中的重要篇章，以颠覆性的历史解读和先锋性的文本实验，重构了“荆轲刺秦”这一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这部作品不仅挑战了传统叙事的逻辑框架，更通过形式与内容的双重创新，展现了潘军作为先锋作家的文学自觉与历史哲思。

一、文本叙述的先锋性策略

潘军的文学创作始终强调“形式即内容”的现代小说观，这一理念在《刺秦考》中得到充分体现。他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时空结构的重组以及语言风格的实验，构建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文本。

《刺秦考》采用了第三人称“他”的叙事视角，与前两部《重瞳——霸王自叙》（第一人称“我”）和《与程婴书》（第二人称“你”）形成对照。这种刻意为之的视角转换，不仅是形式上的游戏，更是对历史叙事权力结构的解构。第三人称的“他”既保持了客观距离感，又通过叙述者的介入性评论，揭示了历史叙事的虚构性。例如，潘军借叙述者之口质疑司马迁《刺客列传》中“图穷匕见”的合理性：“荆轲连一根针也无法带进秦王宫的，怎么刺秦？”这种叙述策略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的权威性，将读者引入对历史真实性的反思。

潘军在小说中构建了多重时空的交织：荆轲刺秦的战国场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汉代背景，以及现代人对历史事件的重新审视。这种时空跳跃的叙事结构，使得历史不再是

线性封闭的过去，而是流动的、可被不断重构的文本。例如，小说中插入所谓“潘军曰”的评论段落，模仿“太史公曰”的史家笔法，却以现代人的视角重新解读荆轲的行为动机，形成历史与当下的对话。这种手法不仅强化了文本的互文性，也暗示了历史叙事的当代性。

《刺秦考》的语言风格呈现出冷峻与诗性的双重特质。一方面，潘军以简洁克制的笔触描绘刺杀场景，如“于是刹那间，荆轲一个箭步上前，趁势拽住了秦王的衣袖，他本可以双手掐住这个人的脖子，一把将其拧断。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凑近这人的耳边微笑着吐出了几个字——我就是那把匕首！”将刺杀行动升华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对抗。这种语言实验既是对传统历史小说宏大叙事的反叛，也是对现代小说诗学边界的拓展。

二、观念颠覆的历史重构

潘军在《刺秦考》中对“荆轲刺秦”的重新解读，并非简单的历史翻案，而是通过颠覆传统叙事支点，揭示权力、人性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复杂关系。

传统叙事中的“图穷匕见”被潘军彻底否定。他认为，以荆轲的剑术造诣，无需依赖匕首的物理攻击，只需“接近并瞬间控制秦王”即可完成刺杀。然而，小说中的荆轲并未选择杀死秦王，而是以“我能杀你”证明能杀而不杀的姿态，完成对秦王的精神征服。这一设定颠覆了刺客作为暴力工具的传统形象，将其转化为一种自我实

现的哲学命题。荆轲的“一意孤行”不再是政治阴谋的牺牲品，而是个体对抗历史宿命的英雄主义宣言。

在传统叙事中，燕太子丹是刺秦计划的策划者，荆轲则是忠义的执行者。潘军则通过权力关系的再审视，揭示了这一计划的荒诞性。小说中的太子丹被描绘为“把玩棋子的权谋家”，而荆轲的刺杀行动则是对其操控的反抗。例如，荆轲的“隐痛”：“以樊於期头颅为信物”实则是“死于谋杀”，这无疑是以血腥仪式解构太子丹的道德合法性。这种重构不仅消解了忠义叙事的道德光环，也暴露了历史书写中权力对真相的遮蔽。

潘军始终强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克罗齐式的历史观在《刺秦考》中体现为对历史真实的自觉虚构。他通过“捕风捉影”的叙事策略，在历史缝隙中植入现代人的认知逻辑。例如，小说在结尾处的叙述：“带着微笑地对秦王说，我早就说过，我能杀你……”这里的省略号大可玩味，完全可以幻化出荆轲与秦王的对话场景，秦王质问荆轲：“你以为史书会记住一个失败的刺客吗？”而荆轲的回答“史书记住的，恰恰是失败者”，直接指向历史书写的选择性记忆机制。这种虚构并非否定历史，而是通过暴露叙事的裂隙，追问真相的可能性。

三、先锋性的文学史意义

《刺秦考》的先锋性不仅体现在形式实验与观念颠覆上，更在于其对当代文学创作范式的启示。

潘军可视为中国新历史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家。他摒弃传统历史小说的“史诗情结”，转而关注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存在困境。与莫言《红高粱家族》的民间视角不同，潘军更强调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介入。例如，他对荆轲“精神胜利”的刻画，暗含了对当代社会中个体抗争意义的隐喻。

作为导演的潘军，将影视叙事技巧融入小说创作。《刺秦考》中频繁使用蒙太奇手法切换场景，并借鉴剧本的“导演阐述”模式，以作者旁白干预叙事进程。这种跨界实验打破了文学与影视的界限，为历史题材创作提供了新的美学路径。

尽管《刺秦考》充满解构与颠覆，但其内核仍是对人性的深切悲悯。潘军通过荆轲的悲剧性选择，揭示了英雄主义背后的虚无与挣扎。这种悲悯并非古典式的哀叹，而是现代人对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

结语：历史作为流动的文本

《刺秦考》以其先锋性的文本实验与深刻的历史哲思，证明潘军作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探索者的地位。他通过颠覆性的叙事策略，将历史从凝固的纪念碑转化为流动的文本，邀请读者参与意义的再生产。在潘军的笔下，荆轲刺秦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故事，而是关乎权力、真实与自由的永恒命题。这种创作姿态，不仅为历史小说开辟了新的可能，也为当代文学如何回应历史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范本。



读《和张岱一起看雪》

刘敬

《和张岱一起看雪》是唐玉霞近年来的报刊专栏文章（以《安庆日报》居多）结集。因是专栏，囿于版面，篇幅往往不长，“唱念做打”却不可或缺，故而作者须有“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深厚底蕴与扎实功力。这些专栏文章，与唐玉霞过往的散文随笔类文字风格确有不同，多为叙议结合、灵动活泼、个性鲜明之作，常能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纵横恣肆，宛似饕餮盛宴。从首篇《和张岱一起看雪》始，至《廊桥遗梦》终，唐玉霞所赏评的对象，多是广大读者所“熟识”的名家名作，张岱、鲁迅、王安忆、海明威、屠格涅夫，《红楼梦》《大地上的事情》《枕草子》《德伯家的苔丝》《伤心咖啡馆之歌》……读者“熟识”，作者更需下笔有新意、行文见智慧、妙论透雅趣，否则读者才懒得买账。

写张岱，唐玉霞开篇便引用王小波“一辈子很长，要跟有趣的人在一起”的名言，另辟蹊径地点出张岱原是一个“有趣”之人，会玩，会闹，风雅

亦奢靡。然而，“繁华靡丽，过眼皆空”，张岱那份超脱物外、寄情山水的情怀还未来得及涵咏咀嚼，“沉痛的国破，剜心的家亡”所酿就的灵魂深处的荒寒，已蔚然蒸腾……作者的笔墨并没有停留在对张岱作品的解读与赏析上，譬如《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而是以文字为媒，悄然引领我们去探寻晚明社会的文化生态和以张岱为典型代表的晚明名士的精神世界，进而通过与李渔、余怀等人及作品的对比，揭示出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对于人生、社会、历史、艺术等的独特思考与共同追求，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晚明文化别样生动的画卷。

写鲁迅，唐玉霞落笔定调，“真实的鲁迅，不是镀金的”。唐玉霞是作者，也是读者，但她不会莫名其妙地赞美，也不会盲目跟风去批判，而是客观、理性地对鲁迅的文字深入研究，无论是散文、杂文，还是小说、书简；对鲁迅的一生多维勘探，无论是婚姻、家庭，还是工作、交友。“注定，

鲁迅受人非议诟病最多，但是不得不承认，他仍然是最勇敢的人，最真诚的人，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最一往无前的战士，一直走在前面的人。”这就是唐玉霞心中的鲁迅。而近百年来，那些很少能够读懂鲁迅文章、从来不曾走进鲁迅内心的人，偏偏喜欢指手画脚，常常乐于喋喋不休，确是可笑的，亦是可悲的。

写清少纳言，唐玉霞直言其“笔下有一种清丽的雀跃”。然而，一部《枕草子》，翻来看去，终不过是于“贫贱寂寥中回忆后宫十年的所见所感，所见无非后宫事宜，所感也无非多愁善感”。目光在纸页间逡巡，唐玉霞联想到的却是寂寞的紫式部、潦倒的曹雪芹，是“他们一笔一笔细细描摹曾经珠玉般滴滴答答落在生活里的感触，像李清照于黯淡的晚年，说：不如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有凄凉，有沧桑，还有淡定和深沉”。唐玉霞目光敏锐，感受细腻。她坦言，清少纳言这个满腔文艺情怀的女人，勉力秉持的清高与矜持，约束了文字里情绪的泛滥，不过文艺或者小资，总有点稚气未脱和此恨只关风和月的执拗，但“我不是笑话，我在这稚气与执拗里和自己劈面相逢”。《枕草子》里草木深，唐玉霞看见的却分明是故乡阡陌间那些她心心念念的花儿。

唐玉霞的这部新著，虽是一本“文艺评论集”，但不管是从谋篇立意、论证手法、表达方式、语言特色等哪个角度看，其文学性、思想性与可读性都远远超出“学术性”。然而，与书籍对话，与作者共鸣，与读者神交，既随心随性、洞若观火，又有趣有味、浑然天成，读来令人颌首会心，不忍释卷，直觉“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不恰是我辈“好读书，不求甚解”之人所希冀、所渴求奔赴的文字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吗？



《和张岱一起去看雪》，唐玉霞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第1版